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女娲的神话与信仰

杨利慧 著

82
222
431.9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女娲的神话与信仰

杨利慧 著

导师 钟敬文

审稿 王俊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北京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杨利慧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12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胡绳主编)

ISBN 7-5004-2084-6

I. 女… II. 杨… III. 神话-研究-中国 IV. 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03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21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7.30 元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胡 绳 汝 信

副主编：丁伟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王俊义	王洛林	王家福
方克立	邢贲思	任继愈	汝 信
李 琮	李慎之	何秉孟	张卓元
张海鹏	陆学艺	陈筠泉	林甘泉
郑文林	胡 绳	钱中文	道 布

学术秘书：冯广裕

BA016/03

此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出版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也走上了轨道。几年来，我们已培养了一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的博士学位论著，有的发表后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产生了影响。我社过去也出版过几本博士学位论著，受到好评。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改变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青黄不接的状况，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二、文库的选题、审稿和定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辑委员会负责。编委会由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有关专家组成。

三、文库所收博士学位论文，是从已通过学位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文中选出的（有的论文作者作了增补）。编委会要求这套文库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所收博士学位论文，能代表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因此文库的选稿和出版方针是少而精、宁缺勿滥。文库面向全国征集文稿，从征集来的文稿中加以精选，然后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将长期出版下去。

四、本文库选稿的标准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本学科的重要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能突破前人结论得出新的

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发展的；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当代重大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研究的。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和风格的论著。所选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严谨的学风，资料的搜集和运用，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应是十分注重其科学性。编委会希望通过这一文库的出版，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中，能倡导一种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哗众取宠的好学风。

五、《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在组织过程中，得到了我国各大学科有关专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我国社会科学博士研究生有关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们的热情支持，我们谨此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希望加强联系，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书稿。虽然我们力求把这项工作做好，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和学识水平的限制，在文库的选稿、审稿、编辑、装帧设计以及印制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敬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序 言

钟敬文

一径蜿蜒石上开，千锤百凿出亭台。游人倘问成功诀，铁样坚心博得来。^①

——西山龙门(《旅滇杂诗》之一)

一种学术的生活史往往要经历着发生、发展以至于衰亡的不同阶段。而它的每一阶段，总有一定的标志。这种标志，大都表现在这种学术的不同方面，例如表现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方面，表现在从事者的人数或素质方面；在现代，也还可能表现在这种学术专业机构的存在或数量方面。而这些不同方面的标志，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

我国先秦时代一段时间，学术上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景象。它拥有孟轲、荀卿、墨翟、庄周、列御寇等一批学者，产生了《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及《列子》等一批思想和风格不同的著作。这些都标志着那时学术的繁荣。晚清在我国学术史上也算得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像章炳麟、谭嗣同、康有为等学者，以及他们的《馥书》、《仁学》及《大同书》等名著，都是这个社会转型期学术昌盛的标志。“五四”时期，如胡适与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与他的《中国文化及哲学》、梁启超与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文艺活动方面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团体与其成员、著作，都标志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盛况。

① 西山龙门景观，相传为清代道士吴来清花了十多年苦力所凿成的。

以上事实,说明了学术史上各个发展时期所显示的标志及其规律性。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已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它的兴起,无疑是应答着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庄严要求的。但是,它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三四十年代,由于社会条件及学科本身根基薄弱的限制,它虽然始终在延续着,有些时候在某些地区还显出兴旺景象,但是总的看来,它并没有走出低谷。

事物的兴替,往往并不能尽如人意所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以历代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在理应该得到重视、扶植。不但我们这些从来为这种学术艰苦奋斗过来的学人这样想望,就是外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也曾经有过这类推想。但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由于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种原来徘徊低谷的学术(从整体上说)终于与其他一些人文科学落入禁区。幸好,民俗文化的某些方面: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由于某些种特殊原因,却受到尊荣、宠幸。在这方面,不但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所等),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集(如《陕北民歌选》、《河曲民歌采访专集》等)和刊物(《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当然,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

十年“文(武?)化大革命”,对中国新、旧文化,都是一个雪虐风狂的严冬。民间传承文化及其研究科学民间文艺学等,不但不能幸免于难,而且连人带物,都被踩在脚下,并贴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封条。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遭到从来没有遭受过,将来也不一定会再遭受的凌辱、贬斥!

“物极必反”。一场大风暴终于过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被无理地扼杀、贬抑、冷待了的人文科学,像春天的草木一样,

重生、滋长,并且迅速地繁荣了。民俗学也没有例外。它在长时期被压抑、摧毁之后苏生过来了。并且像神话、传说中所说的英雄儿,见风就猛地长成起来那样,它在学术界、出版界居然占了一席显著地位。这可以说是对它过去不幸遭遇的一种报偿吧。

短短的十多年来,我们民俗学的发展,在它的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标志。现在且让我们分别看一下。

首先,这种标志表现在专业机构的建立方面。1983年,在我国新民俗学运动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年份。记得在新中国成立的次年(1950)春,我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惜从民俗学的学术范围说,它只限于民俗文化中意识方面的一部分,它的研究未能担当起对民俗学工作全面展开的任务(更莫说它在收集、研究上观点和方法的局限),何况在“文革”时期,它又完全遭到了破坏。因此,在拨乱反正时期,新的民俗学机构的成立就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应付这种时代的要求,经过相当筹备,我们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十多年来,虽然限于经济、人力,工作不能充分展开,但是,它多少进行了一些业务活动和组织工作,起到了学术带头的作用。现在会员已经超过千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并在各自条件的许可下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由于这个学会的存在和影响,全国省、市、自治区,现在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地区级组织。不少文科大学或民族高等院校,开设了民俗学讲座,有的还成立了师生共同参加的民俗学社,致力于这方面的学术工作。近年有些大学或地方研究所,还成立了一些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如辽宁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中心、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江西社科院的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会等。此外好些省、市(如江西、山西、天津、南京、苏州等地),都有民俗学博物馆的建立,这对于民俗知识的普及和研究都是很有益的。

这些有关民俗学机构(包括讲座等)的建立及其活动,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当前民俗学事业的兴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这种学术

的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跟民俗学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相联系,近年来我们民俗学工作的队伍也壮大了。前面提到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的人数,其实,这只是队伍中的一部分,其他不计在内的还有许多(如各省、市学会的会员以及其他机构有关的人员实在不少)。这些人员中,有不少出于对民俗文化的由衷热爱,又处于接触实际资料的有利位置;只要他们专心致志去从事,就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民俗志的著述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地方民俗学者的显著成绩。例如近年出版的刘兆元的《海州民俗志》、刘志文编集的《广东民俗大观》等,都是值得刮目相看的。民俗学队伍的不断壮大和他们做出的成绩,这也是我们民俗学发展的一种标志。

由于民俗学机构、队伍的发展,民俗学专业问题的集体讨论活动(研究会、座谈会)也日见频繁起来了。这种集体研讨活动,从规模上看,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从讨论的题目看,有的是属于基本理论的,有的是属于个别民俗事项的。前者如关于民间文学的性质、范围的讨论,后者如关于白蛇传、吴越信仰民俗之类的讨论。这种研讨会或座谈会,主持者大都事先经过审议、筹划(包括提供有关资料集等),因此,往往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出版了讨论文章的结集。在这方面,我觉得上海、江、浙三省市所一再召开的关于吴越民俗文化的集会,不但其成果令人羡慕,这种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总之,在我国近年民俗学的活动上,这种集体研讨的活动及其成果,也是我们这方面事业发展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标志。

促进我国民俗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是对国外这方面专著的中译,而近年这方面的情形却有比较使人满意的成果。远在二三十年代,跟国内民俗文化的记录和探究同时,一些学者已经致力于国外这方面文献的介绍、翻译,如郑振铎节译的《民俗学浅说》(柯克斯女士原著)、江绍原译的《英国民俗》(江氏编译瑞爱德著的《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的主要部分)以及杨堃译的《民俗学》(汪·

继酒波原著,未译完)等。但是,数量不多,选译的不尽是名著。近年来,我们这方面的成绩就更加显著了。不但译述范围较广、数目较多;更重要的,是介绍了那些必读的世界名著,例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简本)以及汤普森的《民间故事论》(中译本改名《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等。这些译本的出版,不但使我国民俗学更具有世界规模,对于中青年民俗学者的修养也是很有实益的。这种情形的出现,也正是当前我国民俗学发展的一种标志。

在我国现在民俗学的发展阶段,更足以标志它的繁荣性质的,应该说是近年这方面探索、研究的成果。现在我们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上、目录中,都可以见到五光十色的关于民俗文化的新著作,有大部头的丛书、辞典,也有单行本的专著。从其内容说,其中不少是关于民间宗教、民间文学和艺术的,有的则是关于社会组织、人生仪礼及岁时节日的。从内容涉及的时间说,不少是属于现代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历史的。从表现的体裁说,当然不少是议论型的,但也有许多是描述兼议论型的(特别是那些关于历史民俗事象的著作)。这些大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著作,质量当然参差不齐。有的实在具有自己的创见,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这种著作,数量不一定很多,但从我们的学术结构说,它却是顶梁柱式的著作。有些著作虽然缺少创见,但在收集、整理资料和初步探索上尽了一定努力,只要表达清晰,又没有知识性的失误,它对普及这方面学科的知识,和为未来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等,是有作用的;也多少有利于造成当前本学科的热闹气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是高档次的学术著作就轻蔑它。

总的说来,当前民俗学界的研究成果(或半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整个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前面几段论述看来,我国近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情况,大都在各方面被标志了出来。尽管我们这方面今后要走的道路还很长,但这眼前的成就,也不能不使人感到欢欣和鼓舞。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首先开设了“民间文学”(后来因采用苏联学界的用语,改称“人民口头创作”),不久,又成立了独立的教研室,并招收了第一批专业研究生(1953年)。数十年来,我们培养了二三十名硕士、博士(五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因为当时教育制度的关系,没有授予学位)和国内外的许多访问学者。近年来,我们教研室的这门学科,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为了应付学科(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国际学者(如欧达伟教授等)的殷切期望与建议,1993年冬天,我们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现在该所正在积极充实人力、筹建专业书库,以及继续培养上述两种学科的专业人才。

本书著者杨利慧同志,就是今年夏间,以她的优秀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研究生。她的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审阅评语和论文答辩会上的发言中,都给以高度赞扬。有的专家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民俗学、神话学专著”(杨堃博士);有的专家说:“这篇论文有新材料、新见解,是近年国内少见的关于古代神话、传说的好论文”(任继愈研究员);有的专家说:“作者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对神话的见解,对于今后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必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王孝廉教授)。杨同志这种研究上的成就,跟一些同行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一起,也是中国当前民俗学事业发展的一种具体标志。

杨利慧同志的祖籍在四川,本人却出生在祖国边陲的新疆。她的青少年,主要是在那里度过的。大学阶段的学习,是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毕业后考上辽宁大学中文系,攻读民俗学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夏毕业。同年秋转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继续攻研民俗文化学。今年夏,她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现在在同校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中国神话的研究工作。

杨利慧同志天资明敏,学习勤奋,善于思考问题。在学术上,不肯随便接受别人意见,必须经过自己考虑后方才做出肯定或否定,这是一种极重要的从事科学工作的态度或心理素质。关于女

娲神话这个研究题目，本来是我推荐给她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原有一段小小的历史。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可能是在解放的初期），我对于女娲神话很感兴趣，立意想写一篇专著，因此经常收集、辑录有关材料，也形成了一些论点的初步构想。但我始终腾不出一段较长的时间去专门研讨和写作。岁月很快地过去，这件不能下手的工作成了我心上的一件负担。1992年春，张紫晨教授病逝，杨利慧同志的论文指导任务落到我的头上，而她一时还没有确定写作的题目。我就把自己这个想做已久而不能着手的题目推荐给她。她接受了。但并没有按照我原来的构想去进行（我的论文的主题思想，是想通过女娲在神话中的种种活动，去论证这位女神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简单地说，就是我拟作的论文主题是“原始文化史”的）。她所写成的论文的内容，却是关于女娲的神话和信仰的研究，或者说，是“神话学的”和“宗教学的”，而不是“文化史”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驰呢？这恐怕要从她的思想、性格上去找答案。因为在这样庄严的学术活动上，她要凭自己的能力去搜集资料、发现问题和确定论点。她像古代的洁身自爱的学者那样：“不因人热”！

她在搜集资料和分析、论证问题的过程中是相当艰苦的。对着那一大堆内容和产生时代不同（甚至于彼此矛盾）的资料，进行分析、探索、假设、论证。在那段时期里，她废寝忘餐、心焦脑疲，论文初稿完成后，又不断与导师商量，也不断自己进行推敲、修改。甚至论文答辩通过后，她还觉得有些地方没有写好，仍在费神费力地修订。这种情形，不但使那些帮她誊正部分文稿的同学感叹她的认真，连像我这样一辈子与文学打交道并爱字斟句酌的老人，也不能不感佩她的“刻意为文”了。

在这里，我且着重谈谈她的田野作业的大略情形。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这论文的部分论点的形成和论证，而且关系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的应有品格。杨利慧同志为了写作这篇论文，前后曾经两次到最基层去进行调查、考察。现在文科研究生的调查经费

很少,这是大家知道、并且因之多少感到为难的。但她并不为此而放松这项活动。她首次下去,时间是1992年夏天,地区是川北。为了鼓舞她的勇气,当时我口占了下面一首绝句送她:

巴山蜀树路千程,送别玄蝉不住声。

誓探骊珠到深海,背囊鼓鼓看还京。

这次她进行的是一般性调查,具体一点说,就是摸一摸民间的妇女习俗和关于女神的信仰情况。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感性知识和收集到一些文献资料,但收获不算大。她第二次下去,是在1993年春、夏间。她参加了张振犁教授领导的“女娲神话调查小组”的活动,到现在犹存留着女娲信仰的河南的西华、淮阳(特别是前者)及河北的涉县,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和实际体验。在这活动中间,她不但亲眼看到当地妇女们的虔诚行为,也深刻地体味到她们的内心活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重要学术论点。据说在西华的女娲庙会期间,当调查小组已经离开之后,她为了更多更深地体味当地妇女们的信仰心态,曾独自留下来住了三天。经过这样比较深入的体察,在资料上真可说是“背囊鼓鼓”了。记得去年冬间,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张振犁教授一谈到他们的调查活动,就笑容满面地称赞杨利慧同志的大胆和细心。正由于这种大胆和细心,不但充实了她论文的资料,也充实了她论文的整体构思和论证力量。

上文围绕杨利慧同志的论文说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但直接触及论文的地方不多。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我且把对论文的几点意见写在这里吧。

首先,是作者选题方面的眼力。女娲神话,向来被学者注意和谈论的,主要是它的口承文学方面,即神话、传说方面。但女娲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民间传承文化体系(例如关于她的各种习俗、方

言、礼仪、游艺等)。而民间关于她的信仰、祭祀,不但是这个传承文化体系里的重要方面,而且跟语言、文学的传承密切相关。论文作者把关于女娲的神话和信仰(包括庙宇、祭祀及其他有关的种种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论究,这就使论文在定题方面站在更高和更全面的位置上,也使她的论述能得到较好的成绩。

其次,在取材方面的优势。一篇学术论文,在著作上是否成功,条件不限于一方面,但是所凭借的资料是否丰富和确当,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伟大的学者,谆谆劝告我们在这种工作上,必须尽可能掌握大量的资料,理由就在这里。在女娲神话的现代研究史上,芮逸夫、闻一多的论文所以为较多的读者所称赞,这点也正是原因之一。根据本论文作者所述和我们在论文的表述上所看到的,她所拥有的资料数量,说来实在惊人,与女娲有关的达五百余点,单就有关洪水后兄妹婚类型的就超过二百点。这些资料的来源,包括古代和近代文献的、历史考古文物的,而更多的则是民俗学的,即时人的记述和作者个人田野作业的收获。这样丰富的资料的掌握,不但使国际同行看了要羡慕或妒忌,就是国内从事这方面活动的同行们也不禁要啧啧称羨。但是,在科学工作上,资料的丰富,固然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条件,可也带来了处理上的困难,对于年轻的、经验不充分的学者尤其是如此。但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不但能积极地利用了丰富资料,也能顺利地战胜了那种消极的、可能发生的困难。她表现出在科学工作上一定的成熟程度。

再次,善于提出问题、论点并阐释它。在科学工作上,善于发现问题、确立论点,并合理地解释它,这是一种决不可少的能力。作者在这篇十数万字的论文中,提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和论点,这当然是重要的。但这还只是一种可喜的开头,更重要的,是她凭自己的学养和灵活、严谨的思考能力去解析它、阐明它。论文中许多问题、论点的解释,我们固然不能说它都是正确而不可动摇的。但是,它的大多数说法,却能够令人首肯,其中有些解释或判

断,还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如作者坚决认为女娲主要(或原始)的神格是“始祖母”,她对女娲神话、信仰(特别是后者)功能的揭示和阐明等,都表现了作者锐利的眼光、应具的学识和分析能力。这些也正是这篇论文显得优越的地方。

此外,作者在观点和方法的运用上,既有主导方向而又能博采众长;既有原则性又灵活而不拘泥。至于判断和遣词,一般分寸感较强,这也是跟作者一贯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总的看来,这篇学位论文,作者始终抱着严肃态度,具有一定必需的学养,又勇于进行探索。在选题、取材、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等方面,大都有自己的特色或独到之处。全文结构比较恢宏,议论不乏新意和精义。这是一篇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学位论文。十多年来,我负责评阅和有机会看到许多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论文,杨利慧同志的新著,应该说,是其中属于比较高档次的一篇。

自然,这篇论文,像其他许多优秀研究论文一样,它具有值得称许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例如论文中对于产生女娲神话和信仰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它在原始文明史中的意义,又如关于这论题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或有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都很少触及。这种欠缺的出现,既有时间限制的原因,也有作者一时学力不足的原因。尽管这样,这些缺点,并没有怎样妨害到这篇论文的优异成就。

不管从整个学科的前程说,或者从个人的学业的前景说,进步都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民俗学,在世界的学术之林中,还是年轮较少的一株。我们这些从事研究的人,其实还是一些初来者。谁也没有资格,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到了封顶的地步。

杨利慧同志,她年纪很轻,脑子灵活,又能不怕艰苦和寂寞。她具有在学海中鼓棹前进的必需条件。在这初战告捷之际,倘能坚定信心,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磨砺自己的思维能力,再